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走到人民陣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輝（1）

刘湘、刘文輝混战始末 ……黄应乾（59）

田頌尧、刘文輝成都巷战記 ……何煜荣（75）

四川軍閥最后的一場混战 ……陈光藻遺稿（85）

二刘大战二三事 ……楊学端（95）

蔣介石兩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

"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內幕 ……曾扩情（106）

四川省政府及重庆行营成立的經过 ……邓汉祥（117）

川康整軍会議的形形色色 ……甘績丕（129）

抗战初期蔣介石侍从室对四川軍閥的

調查材料 ……秋宗鼎（135）

蔣介石假征藏以图康的經过 ……伍培英（140）

蔣政权在川西边区禁烟的眞相 ……米庆云（155）

西康鴉片流毒造成榮經事变的經过 ……陈耀倫（174）

四川自流井盐稅的掠夺战 ……杜凌云　彭惠中（187）

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回忆 ……黄瑾瑩（204）

楊氏家族与聚兴誠銀行 ……李維城　宫廷璋（226）

我經营重庆复兴面粉厂的回忆 ……鮮伯夏（263）

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厂的經过 ……王世均（284）

China

走到人民陣营的历史道路

劉 文 輝

此文所述，是我从1929年开始反蔣起至 1949 年起义止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史实。这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二十年，我所經历的事情本来是不少的，但因历年所存資料于成都解放前夕全为胡宗南部所燬，而当年經办其事的几个朋友又皆去世，故不可能全部搜集写出。这里所写的，只是脑中記忆的片断。在整理过程中，虽然曾向有关朋友广事征詢，加以补充校正，仍覚不够完整和具体，有的可能还不够准确，希望当年同道的朋友予以指正！

我走到人民陣营經历的道路，是由反蔣而亲共，由亲共而起义。我在这条道路上，前后走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翻天复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我在政治上由假到眞、由黑暗到光明的发展过程。现在，把我走到人民陣营的历史道路扼要加以叙述，以供现代史料工作者的参考。

一 从反蔣斗爭談起

我为什么要反对蔣介石呢？說实話，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具体言之，在1930年以前，蔣介石还在軍閥混战中处于被圍攻的地位，而我在四川的实力正在向上发展，那时的反蔣，是为了扩大个人的政治局面：統一四川，控制西

China

南問鼎中原。1930年以后，蔣的法西斯統治已在全国确立，并逐步把魔掌伸入四川；而我在政治上又逐漸轉入逆境，尤以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錫侯、田頌尧諸部与刘文輝作战）失敗、退守西康以后，处境最艰，朝不謀夕。此后的反蔣，則是为了保持殘存的地盘，以便重整旗鼓，再图发展。

我过去的政治支配欲所以如此强烈，这也是有其阶級根源和社会根源的。1916年我在保定軍校毕业后，回到四川搞軍事，可以說是一帆风順，仅十来年的光景，便由上尉参謀升到軍长。旧中国是枪杆支配政权的。我手中掌握了一支武力，于是四川省主席也、川康边防总指揮也、国民党中央委員也，一齐送上了門，儼然成为川康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旧中国的軍人，照例是兵愈多，官愈高，政治野心就愈大；我自然也不会例外。我懂得武力是扩大个人政治局面的重要資本，故升至旅长时即开始大力扩軍。而扩軍又是和內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打一次內战就要扩編一次队伍。川軍刘禹九、楊春芳等部几万人，就是在战場上經过較量后被我編併的。曾經有一个时期，被編併的队伍比我的基本队伍还多，形成干弱枝强的局面，要經过整理訓练，从組織上思想上彻底加以改造。我办有各級軍事学校，从軍士而尉官、校官以至将官都須参加受訓；从而他們同我的关系，既是长官与部属，又是老师与学生。同时我对人事任免权抓得很紧，自連級以上軍官都是由我亲自选拔。凡此种种，无非是要使所有部属都死心塌地为我个人效忠。軍队光是有人不行，还得把它装备好。我是从两个方面去解决的：一是花錢向外国购买；一是自办兵工工业。为了大量制造武器，开矿山、办工厂、組織技术力量，曾經費了很大的事。我从小就从綫装书上知道“为政在人”这一条，所以付出很大精力去罗致人材：最盛时期，我

China

这个集团的文武干部，包括十几个省籍，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南北各大学的大学生，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錢，而且要花大量的錢。因此，財政問題又成为压倒一切的問題。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扩大防区。当年四川軍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經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爭城爭地。四川軍閥混战十六年，大多为此。我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当仁不让"，每打一次內战即扩大一次防区。在退守西康之前，据有川西、川南全部和川东、川北的一部。在自己防区內，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漁，不恤民困，这是題中应有之文。而盛产盐糖的五通桥、自流井和資中、內江等地又都在我的防区內，盐糖税收为我和刘湘所瓜分。因此，搜刮的財富也較其他四川軍人为多。但是我的政治局面日益扩大，支出日益增多，仍然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又开銀行，办实业，进一步扩大剝削，去填补財政上的无底洞。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戶，財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蔣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給我制造了許多乱子，弄得我終日焦头烂額，无法应付；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鴉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飲鴆止渴的办法，曾經引起国內輿論的非議，那已經是穷极无聊了。

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黃金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揮，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所控制。少年得志，不可一世。我后来曾用三句成語来描繪当时的心情："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侷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門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因此，我那时的主意是：內外并举，左右开弓，即一面在夔門以內加紧消灭敌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势力，去实现統一四川的夙愿；一面乘滇黔軍人內訌的机会，支持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打回貴州，为控制西南奠立基础。但是統一四川，控制西南，仅是我的政治野心的一部分，最終目的还在于向全国范圍內扩張。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利用和支持下，互爭政权、大起內訌，不惜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向絕地。不同的阶級走着不同的道路：被压迫的人民是投入革命，从革命斗爭中去求得自己的解放；而我呢，属于反动統治阶級的当权派，自然是参加国民党內訌，从內訌的角逐中去实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认为当时国內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蔣浪潮，是我問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蔣介石，胁迫他下台，让我們这一羣人来掌握中国政权。这次反蔣，是承桂系和馮系西北軍反蔣失利之后而发动的。蔣在軍事上本来占上风，同时我們事前的組織工作又沒有作得到家。因此，战爭爆发之后，馮玉祥的西北軍态度不明，閻錫山的晉綏軍按兵不动，两湖同情我們的軍人又中途被蔣介石收买，而我的部队又远在四川、一时出不来，以致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陷于孤軍作战，不到一个月功夫就告失敗了。这个时候，我同蔣介石在政治上已經是水火不相容；但因蔣正忙于对付閻、馮，无力西顾，而我亦因向中原初試鋒芒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机观变；所以彼此也就都暫时不了了之。1930年3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組織討蔣联軍，爆发了中原大战，7月汪精卫北上，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議，与閻馮桂合作組織政府，同蔣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唱对台戏。我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决不能放过。

China

因此，当閻馮桂酝酿討蔣向我征求意見时，即极表贊成；并暗中积极准备出兵进攻武汉，以配合閻馮联軍的中原大会战。不过鉴于前一次反蔣失敗的教訓，火色不能不看老一点，所以直到扩大会議举行的前三天，即9月6日才发出魚电公开反蔣。我滿以为这一下蔣介石一定会被打下去。誰知斜刺里杀出了一个李逵来，張学良忽然改变騎墻态度，倒向蔣介石一边，率領奉軍入关；因而扩大会議一哄而散，这次反蔣又以失敗而告終。

1930年扩大会議的夭折，是国民党内部反蔣斗爭的最后一次失敗。从此以后，蔣介石成了中国的大独裁者。我曾有过两度反蔣的历史，同蔣已經是冰炭水火，摆在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向蔣介石投降，作他的馴服工具；二是脫离政治生活，到外国去作寓公；三是坚持反蔣斗爭，从斗爭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前两条道路，同我这样一个人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不愿意走。事实上要走也是走不通的。因为蔣介石是一个大流氓，向来欺軟怕硬，你有本事整他，他便将就你；你若退让，他就叫你活不下去。势成騎虎，欲罢不能，只有走最后一条路，同蔣介石斗爭到底。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坚持反蔣斗爭的原因。

二　走亲共的道路

反蔣失敗，轉而亲共，亲共之后，继續反蔣。这是我在解放前一个較长时期内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前已言之，我的反蔣，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因为，在蔣介石反动集团的压迫下，特别是抗日战爭时期蔣的势力已經深入四川的时候，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自从

China

1930年北平扩大会議失敗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垮的垮、降的降，已經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依靠。因此，我决定走亲共的道路。但是仅有主观要求也不成，同时又有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統一战綫政策为一切反对蒋政权而愿意向人民靠攏的人們敞开了大門；其次是，随着时間的推移，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凭借了这两个有利条件，所以我的亲共也就由假到真，即由原来利害上的暫时利用逐漸变成了政治上的长期依靠，終于脫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了人民陣营。

我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1938年，即抗日战爭发生后的第二年。四川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頻繁和密切。現在，就我脑中印象最深而又认为重要的事实，略述如下：

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紹禹等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議，道經成都，与我会面于我方正街住所。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志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希特勒德国駐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誘降的时候，投降主义的逆流汹濫于国民党的权貴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險恶，所以我們这次的話題也是以如何团結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爭，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从他們三人的談話中，我已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針和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政策；同时我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針的态度向他們作了明确的表示。經过这次会晤，我同党相互間都有了了解，为我进一步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

1939年夏天，我和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第

China

二次会晤。时距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久，蒋政府的各軍政机关都已疏散下乡，抗战亡国論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故我們这次会晤，也主要是談的有关抗日战爭的問題。他們几位向我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闡釋了抗战必胜、妥协必敗的道理。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談是有重大影响的。

1942年2月，我同中共中央領导人之一周恩来第一次見面。这次会晤，事前是通过民盟的朋友联系的。为了避开蒋介石特务的耳目，时間在深夜，地点在重庆机房街吳宅，在座只有周和我二人，約談了一小时，談完后周馬上走了。周在談話中給我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說："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結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鍵則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他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統治的斗爭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最后他还給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說"团結就是力量，須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結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結去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結。""团結是为了斗爭。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須給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現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給以支持。"（以上是引述周談話大意）周的这一番話，使我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力量。經过这次会晤以后，我同党的关系，也就由一般联系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1942年6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我經常联系，并設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針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我傳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軍政动态向党中央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汇报。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我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譯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这个电台的設置，也是經过一番周折的。我事前就料到蔣介石的特务要来进行破坏，故把它安在蓄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駐有一連卫兵。王少春和我直接联系，如我离开雅安时则指定我的两个参謀长張伯言和楊家楨同他联系；除此以外，王不同其他任何人打交道，以保持秘密。当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間以后，蔣介石的特务即有所覚察。他們暗中由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設在雅安城内，正要进行偵察和干扰，我得报后，立即派兵搜出予以沒收；并警告蔣介石派在二十四軍軍部搞特务活动的政訓处主任丁国保說："現有奸人在雅安密設电台，图謀不軌，我已沒收；如果以后再有此种不法行为，定要严办。"他們由于沒有抓到把柄，又加上我这一警告，以后也就再沒有在这上面搗乱了。所以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經历将近八年而沒有被破坏。解放后，王少春到重庆高兴地向我說："你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1943年11月和1944年6、7月間，我曾派代表楊家楨到重庆和王若飞先后有过两次会晤。在那些年月里，正是蔣介石反动集团向我节节进逼的时候，不是以对藏用兵为名要把我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就是要派伪中央軍进駐西康来控制我的行动，我一年到头都在紧張中过日子。王若飞通过我的代表每次都給我分析了情况，出了主意。他告訴我，蔣介石反动集团的本性是外强中乾，我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蔣就会知难而退。他一再給我打气，叫我不要松勁。我听了朋友的話，坚持了反蔣斗爭，終于一个个的难关被克服下去了。后来我意識到，这就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我的有

China

力支持。

1945年2月間，張友漁到成都，党派他帮助我进行政治理論学习。他每天清早就到我方正街住所，給我系統地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讲解革命理論和党的方針政策，連續达一个多月之久，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

1946年2、3月間，正值旧政协会議閉会后不久，周恩来将要离开重庆去南京的时候，他嘱民盟的朋友轉达我："政协决議能否实現，联合政府能否組成，要看蔣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現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論怎样演变，斗爭总是不可免的；对蔣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还叫民盟这位朋友特别提醒我，說今后的政权問題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誰也站不住。他鼓励我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点，以取得人民的支持。我体会到：周的这一番話，不仅是向我說明了当时国內的政治形势，同时也給个人指明了政治前途。

在这些年月里，我在政治生活中經历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是，如上所述，共产党主动向我伸出友誼之手，誠恳地关怀我，热情地支持我；而另一方面，蔣介石反动集团則視我若眼中釘，不断地在政治上排斥我，在軍事上压迫我，必欲去之而后甘心。这种切身經历驅使我，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亲近，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則越来越乖离了。

三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爭

我走上亲共的道路以后，在政治上已經沒有孤立的感覚，因而反对蔣介石反动集团的勇气也就更增加了。1938年夏季，我的代表曾庶凡从汉口同成都告訴我："武汉守不住，蔣介石决定迁都重

China

庆。”我认为，蒋的大队人馬一西上，首先就要控制川康地盘，而他要实现这一目的，又必然要消灭地方力量。我們則与蒋的利害恰相反，必須保持自己力量，继續控制川康地盘。因为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在政治舞台上立足，也才有条件拥护共产党抗日；所以非拼命不可。这就使得我們同蒋介石反动集团之間的一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爭成为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場斗爭，应該怎么办？这是我朝夕困心衡虑的問題。我知道蒋介石消灭地方力量的办法，向来是各个击破，我們要对付他，就必須团結西南地区同蒋对立的实力派，共同行动，互相支援，才有办法。同时中共的領导人也一再告訴我，团結就是力量。因此，团結西南地方实力派就成为我們反蒋斗爭的重要关鍵。当时貴州省的地方势力已被蒋整垮，該省几乎完全为蒋系势力所控制，工作无从下手；西康省的軍政大权則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沒有問題，只是如何巩固內部而已。因此，团結工作的重点在于川、滇两省，其中四川尤为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四川是西南政治、經济的中心和西康的門戶，同时又是我出生和发跡的地方，在政治上社会上有較深厚的基础，所以我人在西康，而心实未尝一日忘情于此。現在，四川已成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彼此都是势所必爭。而当时川省內部情况又非常复杂，事情很不好办。根据我当时的分析，四川軍政界的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是属于頑固派，他們是坚决反共、反人民，死心踏地为蒋王朝效忠的；二是属于中和派，他們既想做蒋介石的官而又怕蒋把他們的力量吃掉，既反共而又不为已甚，在政治上总是踟躕瞻顾，依違于拥蒋和反蒋之間；三是属于元老派，他們多年在野，大多习于明哲保身，意态消沉，与現实政治生活几乎脫节，但在地方上还有一些偶象作用；四是属于高干

派，他們是四川軍政界的高級干部，在地方上的发言权虽不大，但是对一些地方首脑人物却有較大的影响，而且其中有些在政治上有进步傾向，能起积极的作用。我认为，头一派是斗爭的对象，后三派是联合的对象。根据这个分析和长期的体察，我覚得四川地方实力派中的邓錫侯、潘文华是应当合作，也是可能合作的。尽管我和他們之間对政治上的看法各有不同，对四川地方的权利之爭也互有矛盾，但是大家都想保持四川地盘和自己实力，不愿意被蔣吃掉，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正因为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所以我們三人在反蔣斗爭上是长期合作的。当然，由于个人利害上的冲突，我們在合作过程中，有时也是同床异梦，互相傾軋，但是涉及到共同的利害問題，又站到一条战綫上来了。从1938年拒絕張羣作四川省主席的事件起到解放前彭县起义止，中間經历了一系列的反蔣斗爭，我始終是联合他們在一起来进行的。

在团結西南实力派的活动中，我所注意的另一个重点是云南。因为云南在地理上与川康接壤，而龙云在政治上的处境又和我大体相似，所以我特别重視同龙的合作。本来，我同龙过去的关系是不够好的，如1929年我支持胡若愚打回昆明，就是去拆龙云的台的。为此，多年来彼此都耿耿在心。但是蔣介石的压迫，却給我們勾銷了夙怨，成为反蔣斗爭的同路人。1938年6、7月間，龙云到汉口去晤蔣介石，来去都在成都路过，我和邓錫侯、潘文华等趁机同龙商討了川滇康三省联合反蔣問題，大家意見一致，还签訂了一个协定，內容大要如下：（一）一致拥护抗战国策；（二）如有違反抗战国策者，即为川滇康三省之公敌，共同反对之；（三）为确保抗战国策之实現，三省在軍事、政治、經济各方面須实行合作，关于合作具体办法另行派員商定。龙、邓、潘和我都在协定上签了字。在签訂这

China

个协定的过程中，因王纘緒一度参与商議，不久他就向蔣介石告密，蔣曾电龙警告，不要他干与川康事。但是龙还是坚守約言，未为所动。为了保持机密，以后即同我单独联系。龙曾派他的总参議李雅宾到雅安同我商討具体合作办法。当时成立了一个君子协定，因我先同共产党有联系，政治上由我負責，軍事上則因龙拥有較大的优势，由他負責。同时还由龙和我投資籌設正成商行，想通过这个企业来实現經济上的合作（后因恶性通貨膨脹和人事安排不善未搞成功）。共产党对我和龙云的合作很关怀，华崗曾由昆明到雅安住了一个时期，同我几度长談，主要就是为了密切我和龙的关系。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爭时期中，我同龙一直是紧密合作的。記得1944年冬季日本侵略軍一度打到貴州独山，整个西南为之震动，龙曾来电征詢我的意見，我即約集"唯民社"（我和一些进步人士在抗日战爭时組織的秘密政治团体，詳第四节）的一些朋友研究了一番，答复龙：如果敌人繼續西侵滇康，我們要动員地方力量抗战到底，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决不能有任何动摇。龙比复电表示同意，并各自在滇康两省作了一些动員抗战的准备工作。到1945年10月，龙云在蔣介石的武力压迫下离开云南被軟禁起来，我們的合作关系才被迫中止了。蔣介石在解决龙云的前一天，悄悄地来到了西昌。接着就給我打来了一个电报，說什么"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政通人和，不胜欣羡"等等，一派鬼話。这样突如其来，我以为他要在西康搞什么名堂了。到10月3日深夜，王少春跑来告訴我，說剛从电台收到消息，蔣介石已命杜聿明在昆明出动武力解决了龙云。这时我才知道蔣来此的企图：一来是便于就近指揮昆明軍事解决龙云；二来是給我顏色看，怕我对昆明事变表示声援。他向我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則等于警告我："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这确是一

China

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此后我对蒋的警惕就更加提高了。

西南实力派的团結，为反蒋斗爭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們同蒋介石反动集团之間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爭也随之而长期化和尖銳化，从抗日战爭时期到解放战爭时期，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年到头几无宁日。現在，仅就抗日战爭时期我們同蒋介石反动集团斗爭的重要事实略举如下：

对張羣的拒絕和利用 1938年春刘湘病故，蒋介石认为是拿四川的大好机会，便馬上向我們打出了两張牌：一是撤銷川康綏靖公署；二是派張羣继任四川省主席。这是抗日战爭发生后蒋阴謀控制川康的首次尝試。消息傳来，引起了川康軍政界的强烈反应，刘湘高級幕僚張斯可立即找我駐蓉代表段升阶，要我快从雅安到成都来筹商对策。时邓錫侯尚在前綫抗战，我同潘文华和刘湘部下的其他几个将領会商，都认为这么一来，軍权政权都給抓走了，四川就成了姓蒋的，沒有我們的話說了，决不能答应。同时还估計到，正在全民抗战期間，蒋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只要我們一致反对，他就沒有办法。于是决定向蒋提出反对意見：主張保留川康綏靖公署；拒絕張羣来主川政。在我們的坚决反对下，蒋被迫改变了主意，向我們討价还价：一面答应保留綏署，以邓錫侯任綏靖主任；一面又要求在不更动省府委員和各厅处长人員的条件下，派張羣独自一人来接省主席。我們认为这是誘魚上鈎，只要張一插足进来，四川局面迟早要为蒋所控制，所以还是不让步。蒋見計不得售，便自我轉圜，改派張羣为重庆行营主任，由四川将領自推一人暫代省主席，才了此一桩公案。1939年，蒋又旧事重提，要張羣继王纘緒为四川省主席，我們再給頂回去，蒋无可如何，只好亲自来兼領，而由賀国光以省府秘书长身份代行其职权。这样又鬧了一年多，中間

China

經过許多周折，到1940年冬張羣才坐上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張羣本来是蔣介石的亲信，一切听命于蔣，始終为蔣效忠。但因鉴于川康地方力量不好对付，如果操之过急即可发生事变，于蔣于他本人均属不利。同时他和 CC、复兴为了爭权夺利，一向积不相能，又要倚川康地方力量以自重，所以他对我們不能不敷衍几分。我們就抓住他的这种矛盾，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我們对張羣的态度前后有所不同，即：在他未来之前是坚决拒絕，既来之后則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之中，彼此間的斗爭也是极其尖銳和复杂的。張羣一貫施展其纵横捭闔的伎俩，在川康实力派中进行离間分化，无孔不入，能整則整，企图尽量削弱地方力量，来为蔣控制川康的局面。我們对付張羣的办法是：一面防止他的阴謀，在无关大体的事情上可以适当让步，如果涉及川康地方全局和自身政治得失的問題即坚决拒絕，絕不上他的当；一面利用他的关系，在我們和蔣的对立状态中起一些緩冲乃至掩护的作用，来保持我們在川康的軍事和政治上的权力。張羣之为人，是詭計多端很够对付的。他同我們进行斗爭时，往往是随着国內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当形势于蔣有利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显得强硬，各种名堂都来了。反之，蔣若处于逆境，他又以温和的姿态出現，向我們表示妥协。我們同他交道时也是經常掌握政治寒暑表，根据不同的气候作不同的因应，有剛有柔，有攻有守。彼此之間长期圍繞对川康的控制与反控制这个中心問題作文章。这种又反对、又利用的关系，前后維持了将近十年之久。

赶王纘緒下台　1938年我們头一次反对張羣任四川省主席时，继任人选，原来推的是潘文华。当时潘因体弱多病，不胜繁剧，力辞不就。同时鉴于王纘緒平日之为人，利慾薰心，反复无常，怕

China

他出卖地方倒向蔣那一边去，乃将省主席职位給他，使之安心跟着我們走。誰知此人本性难移，一經与蔣挂鈎即被收买，把我們的反蔣內幕通通向蔣告密；任省主席后的所行所为，又复处处与我們对立，充当蔣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我們当然不能容忍。我乃和邓锡侯、潘文华商定，发动我們下面的七个师长彭光汉、刘树成、周成虎、謝德堪、陈兰亭、刘元璋、楊晒軒联名发出电报，历举王纘緒十大罪狀，要蔣撤去其省主席职。犹恐仅此而不行，还調了一部分軍队集結在成都城郊，劍拔弩張，准备动武。蔣看到这个势头，知众怒难犯，不得不让步，于是王纘緒就被赶走了。

以武力解决曾魯　1939年蔣介石派他的爪牙曾魯到西康，利用雅安团管区司令的职权，与雅属各县及名山地区的土匪恶霸勾結起来，委以官职，賄以金錢，大肆招兵买馬，准备把一羣流氓土匪收集起来成立一个志愿师，企图利用这一武力来控制西康。由于有蔣在后台給官給錢，进展非常迅速，到1941年春間，即已凑成了两个团。我看出了苗头，认为"細石头可以打烂大鍋子"，便趁其尚未发給武器时，来一个"先斬后奏"，派两团兵将其包圍，强迫解散。事后电蔣，告以曾魯違反"兵役法"收編土匪，破坏地方秩序，已予紧急处置，請其"察照备案"。蔣看到"木已成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乃电复"准如所請"，并把他的爪牙曾魯調走了。

抗拒蔣家軍开进西康　1942年蔣介石借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拒絕修筑康藏公路，命令我二十四軍出兵討伐，另派两师中央軍进康接防；实际上，是借图藏以图康，要把我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而以蔣的嫡系部队来控制西康。我識破了这个奸計，就將計就計，立即慨然表示接受这个任务，并拟訂了一个对藏軍事計划，提出了对藏用兵的三易三难：前方作战易，后方勤务难；速战速决易，苦战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